

# 这所女校何以载入史册

何东宝



题图上:北洋女师范学堂徽章;题图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主楼。

## 薪火燎原,淬炼红色革命基因

清末新政时期,女子教育方破土萌芽。学堂创办之初,首任监督傅增湘颁布《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文规定“一切急激过新之学说、时论,概或弗措”。章程的制定,意在平衡新旧学风,规避激进思潮争议,为女学安稳存续保驾护航。颇具历史辩证意味的是,纸面之上的保守规约,并未束缚校园之内的思想生长;恰恰相反,女师在时代洪流里孕育出颠覆旧式社会秩序,唤醒近代女性意识的燎原星火。

这簇星火的萌发,根源在于学堂开放包容的办学取向。校方打破旧式女塾只读经书、专学妇德的单一模式,广纳进步名师,革新课程体系,开设教育学、家政、地理、历史、国文、图画、音乐、体操等新式课程,开阔学子视野。更难能可贵的是,学堂将家国理念融入日常授课之中,形成独树一帜的育人底色。时任校长齐璧亭(此时学校名称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曾专门向地理教员白眉初请教治学要义,白眉初直言:爱国、学地理之首;建国、学地理之本。这句教学箴言成为女师贯穿始终的课堂准则,让求知求学不再局限于安身立命,更与家国兴亡紧密绑定。

新式课程启迪心智,爱国理念浸润人心,女师学子挣脱封建思想枷锁,迅速接纳民主、平等、救国等进步思潮,成长为北方女性觉醒与爱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学堂也因此被时人誉为“革命精英汇集所”。辛亥革命时期,地理教员白雅雅以课堂为革命阵地,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女师学子黄守璟、汪芸等人以身赴险,伪装成“孕妇”为革命军转运军火,用热血冲破女性只能囿于闺阁的世俗偏见。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女师一跃成为天津爱国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阵地。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引领巾帼女性投身反帝爱国浪潮。对于母校校风与学子特质,邓颖超曾在文章中作出精准概括:“那时的女师的同学们,是何等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识,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缺少的精神,尤其是女子所缺少的精神,竟能在女师同学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可贵啊!”

更为可贵的是,女师学子不只接纳新思想,更主动推动社会变革。正如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中所述:“天津学联之成功地男女成员合并

及男女平等担任工作,乃有赖于女师的争取与推动。女师在本世纪初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确实起着领导性的作用。”觉悟社的诞生,更是女师精神最直观的缩影,社团十名女性成员皆出自本校,她们与周恩来、马骏等进步青年并肩求索,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周恩来同志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清扬,到远赴欧洲勤工俭学的郭隆真、张若名,再到少年立志救国、毕生献给革命事业的邓颖超,一代代女师青年,从青砖教室走向革命前线,让这方校园成为北方红色思潮的重要摇篮。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大肆摧毁天津路校舍。危难时刻,院长齐璧亭(此时学校名称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率师生开启教育长征,西迁并入西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坚守教育阵地,撑起了教育抗战的一片天空。隐蔽战线上,王新、郑黎亚等校友潜伏各方,以身许国。从思想觉醒到投身革命,从街头呐喊到烽火坚守,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女师的精神血脉。

## 大师立教,涵养开明治学文脉

百余年来,天津路四号文脉昌盛,贤贤毕至。傅增湘、吕碧城、张伯苓、张相文、曹禺、李霁野、李何林、冯沅君、顾颉刚、蒙文通等数十位近现代名家先后驻足执教。他们兼容新旧,博采中西,以开明包容的治学风气,构筑起女师深厚的人文底蕴,也为学子思想解放筑牢根基。

创办者傅增湘统筹办学全局,平衡传统妇德与现代教育,搭建完善的女子师范课程体系;教习吕碧城高举男女平等大旗,主张女性兼具学识与傲骨,为北方女子教育破冰开路。一众名师各展

所长,在不同领域培根育人,革新学术,留下影响近代中国的宝贵财富。

近代地理学先驱张相文在此讲授新式地理课程,主持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出版《地学杂志》,普及近代科学地理知识。上世纪30年代,戏剧大师曹禺受聘于女师,负责国文与戏剧相关课程,他走入市井街巷,体察底层女性真实生存状态,在教师宿舍内完成经典剧作《日出》。翻译家李霁野专任女师教学工作,潜心文学翻译事业,在女师任教期间完成长篇经典著作《简·爱》首个中文全译本。

自由开明、兼容并包,是女师最鲜明的校风标签。曾于1929年至1931年在女师国文系任教的李何林在《回忆天津点滴》一文中提及:“院长齐璧亭在学术思想上则颇开明:他不干涉教师在讲课时的观点……大有蔡元培掌北京大学时对各派思想‘兼容并包’的样子。”也正是这份难得的开明校风,让新思想、新文化得以在校园内自由流转,与新式课程相辅相成,培育出一批兼具学识、思想、胆识的新式女性。

## 滋兰树蕙,初心映照百年芳华

清末民初,国内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女学盛则国必强,女性承担家庭教育的主要职责,女子素养高低直接影响国民素质,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强弱。

基于这一时代认知,傅增湘、齐璧亭等办学始终笃定办学方向:突破封建桎梏,普及优质女子教育,培育兼具文化素养、独立人格、家国担当的新式女性,以女学兴家,以家教强国,以国民振华夏。百余年间,女师培育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女性人才,她们走出天津路四号,奔赴华夏四方,以多元姿态活跃在革命、文艺、教育、学术等各行各业。

一部分学子挺身而出,成为时代变革的先行者。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张秀岩等巾帼革命者,舍弃闺阁安稳,以身许国、矢志不渝,投身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事业;许广平追随鲁迅先生,奔走于妇女解放与思想启蒙一线,成为近代新女性的精神标杆;中国近代第一位女雕塑家王静远,凭出众才华惊艳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斩获“女子光荣之一页”的至高评价;于蓝、凌叔华、张秀亚等文艺大家,以笔墨、影像为载体,传递人文温度与红色信仰,丰富当代中国文艺版图。

另一部分学子教化后辈,涵养家风,践行“国民之母”的时代价值。她们接受新式教育之后,以独立思想打理家庭、教养子女,既协助伴侣开拓事业、造福社会,又以开明先进的教育理念培育后辈,为近现代中国孕育培养高素质人才,以润物无声的柔美力量,助推社会迭代前行。

一百二十载岁月更迭,文脉不灭,回望百廿来路,答案早已清晰:北洋女师范学堂何以载入史册?因其敢开时代先河,首创公立女子师范办学模式,打破封建女子教育的尘封枷锁;因其红色薪火不息,以开明校风培育无数革命志士,成为北方女性觉醒的精神坐标;因其大师云集立教,兼容新旧学识,沉淀独树一帜的人文学风;更因其坚守救国育人初心,践行“女学盛则国必强”的办学理念,培育一代又一代新式女性,改写近代中国女性命运,深刻影响20世纪历史进程。

我关注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由来已久。今年春天,我应江苏一家出版社邀约,翻译了这位作家的一部中篇小说,即将在暑期出版。100多年前,在远东乌苏里荒山野林里,一个俄罗斯的年轻人和一个采参的中国老人偶然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老一少就是普里什文中篇小说《人参》里的两个主人公。

年轻的俄罗斯人是参加1904年日俄战争的士兵。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被炮弹震晕了过去,等他苏醒过来时,战场上遍地尸体与弹坑,他漂泊流浪到乌苏里的原始森林,遇到了一位中国采参老人。这位好心肠的老人收留了他。他们俩一起打猎,寻找人参,后来又一起修建养鹿场,两人成了知心朋友。

俄国士兵逐渐感受到中国老人的善良、宽容

实际上存在语言障碍。卢文只会少量的俄语日常用语,这个漂泊的俄国士兵不懂中文。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对话很少,有时候需要借助体态或手势来表达各自想说的意思。这一老一少之间更多的是心灵感应。

天长日久,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并非总是那么和谐,他们在生活观念上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卢文老人比较保守,他认为不换角的鹿是长寿雄鹿,年轻的俄国士兵想破解这个谜,竟然打死了一头不换角的雄鹿,从而解开了其中的奥秘。但他对卢文老人依然心怀恭敬,彰显出他的包容与智慧。

小说中还有一个情节耐人寻味与深思,那就是人参的自我保护功能。一棵生长在荒山野林里的人参,如果它的枝干茎叶受到伤害,那么就会停止生长,休眠七年之后才会冒出新芽,再次生长

# 苦难与智慧交织的际遇

——普里什文小说《人参》译后记

谷羽

和精明强干,认为遇见这位老人是他的幸运。他说:“我很幸运,我身边有卢文,他是世界上最慈祥、最温和的父亲,我可以大胆地说,卢文算得上普天下最有文化涵养的父亲,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很少见。”

他发现,卢文不仅擅长打猎,还会用中草药开方治病。年轻人感慨地说:“渐渐地,我明白了,卢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是行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难以作出判断,但我亲眼所见,所有到他这里来求医看病的人,跟他告别时都面带笑容,相当满意。也有不少人,稍后还会回来看望他,只不过为了当面向他表达感激之情。”

经过日积月累的观察,这个年轻人不断抒发自己的感受:“跟其他猎人相比,卢文老人让我心怀敬佩,甚至让我感到惊讶。他不仅拥有探索精神,对于自然界的花草树木,更是抱着体贴关爱的态度。他不仅能分析原始森林里生活的种种现象,还具备一种能力,让某些濒危的神奇植物死而复活。看来,他在岁月的磨砺中,经历了深刻的精神转变,因此他抛弃了残忍的狩猎杀生,转而去寻找生命之根,去守护人参。”

“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刻,卢文老人总会出面帮助我。他不直接指点我该做什么,往往面带微笑,提醒我,劝慰我,说我的生命之根完好无损,只不过暂时休眠罢了;因为头顶遭受了一只黑鹿蹄子的践踏;过几年以后,茎秆上还会开花,继续生长。我对老人们的深信不疑,我沉思冥想,这生命之根有多么神奇!跟我的脉搏一起跳动,让我的生命焕发出蓬勃的朝气,钻心的疼痛忽然消失了,心中涌现的是无尽的欢欣,因此我下决心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让卢文老人,也让那几个中国人感到开心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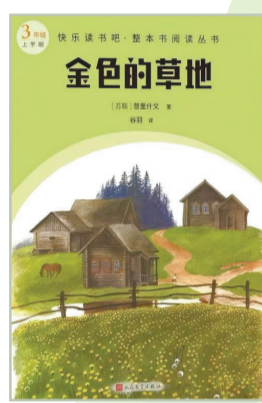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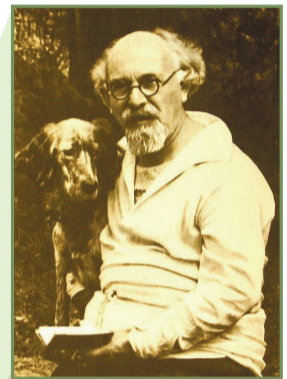
随着生活的磨砺,这位号称“大厨”的俄罗斯年轻人,逐渐有了自己的事业,回顾个人经历,他说出的一番话特别富有“哲理”色彩:“人身上蕴藏着多么丰饶的处女地等待开垦,多么无穷尽的创造力等待挖掘啊,千千万万不幸的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们来不及了解自己的生命之根,来不及了解人参,他们无缘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开发力量的源泉:勇气、欢乐和幸福的源泉!”

俄国士兵,故事的讲述者,对待中国采参老人卢文的态度,概括来说就是敬仰与尊重。

卢文老人对这个俄罗斯年轻人的看法,应该说是赏识。他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学识和才华,对他的发明创造能力由衷佩服,因而称呼这个年轻人“大厨”。

卢文离开中国,离开故乡,主要原因是由于跟哥哥分家时,父亲偏向长子,他受了很大委屈,一气之下远走天涯,决心混出个样子,才有脸回转家乡。不料一场瘟疫夺走了父亲和兄长的性命,他不得不主动承担起接济嫂子和几个侄子侄女的义务,充分展示出人性的宽厚与善良。

卢文和俄国士兵,这一老一少之间的交流,实



本文作者 翻译的普里什文 作品



并开花结果。这一自然界植物生长的神秘现象,都被卢文老人和“大厨”牢牢记在心里;这是生命之根人参带给他们的启迪与智慧。

从2005年1月到2026年1月,这20多年里,我断断续续翻译过普里什文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第一部)、叙事诗《林中水滴》、散文集《一年四季》、童话集《金色的草地》和中篇小说《人参》。

我翻译这部小说《人参》,需要说明以下两点:一、原作十六章没有标题,我为每章增加了标题;二、原作语言句子很长且不分段,除了少许对话,几乎很少出现段落,这样读起来并不轻松。因此我依据内容分段,长句子经过分析理解,调整为连续的短句。这样处理,出发点有二:一是有利于编辑校对编排目录,二是有利于读者阅读思考和记忆。

普里什文1873年出生,1954年去世,活了81岁,经历了多次战争、社会变革与动荡。他从1905年到1954年坚持写日记,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依据日记修改而成的。1931年,普里什文前往远东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用时3个月,《人参》(1933年发表)就是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也是他远东考察的重要成果。

1992年,在普里什文逝世近40年之后,他的十八卷集日记开始在俄罗斯陆续出版。

我喜欢读普里什文的日记,喜欢他的小说《人参》,他在其中借助人参、梅花鹿等自然意象构建文学空间,使作品富有中国情趣和韵味;我喜欢这部小说中的哲理思考,作家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他的生态思想;我还喜欢作家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我相信读者也会喜欢这部苦难与智慧交织的中篇小说。

“白蹄枣骝”也关进去,让老虎相斗。场面相当惊险刺激,虎不断前扑撕咬,马则奋力扬蹄,连连踢中老虎的口鼻,差点将其踢死。朱祁镇观看了这场惨烈的“搏斗”,意犹未尽,让画师为“白蹄枣骝”画像,并赋诗《白蹄枣骝踏虎歌》,歌颂这匹战马大战老虎的“事迹”,画与诗装裱在一起。那幅画早已不知所踪,朱祁镇的颂诗却流传下来,保存在天津博物馆。朱祁镇的写字写得圆润端正,有一定功力。

明末战火四起,朝廷重拾马政,重申《厩牧例》禁私借、盗卖之规,从蒙古紧急购买良马,规范养马制度。马头们的职场环境略有改善,马的形象也随之“回正”。但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交织,马政的复苏已难挽王朝颓势。

明代的马是马政制度的晴雨表,也是王朝命运的见证者。

# 妈祖祭典:信仰漂流与活态传承

马知遥

洁上丛话



妈祖,本来专属于南方沿海渔村的保护神,经各代朝廷敕封之后,她从一个普通的林姓女孩成为天妃,后来成为天后,地位在民间神灵中极高。但南方的沿海保护神怎么到了北方,而且成为天津的地方神灵,受到本地百姓的拥戴呢?这和天津靠海,既是港口城市又有漕运有关,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商船,顺着就把南方的习俗带到了北方,这种文化漂流或者信仰挪移现象,正显示了在中国大地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关系,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而变迁,一地文化随着人口的挪移被带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文化迁移的规律。

我想起多年前曾去河南新乡拜谒比干庙,庙前石碑上模糊的文字是民间对比干家族的记载,其中有段文字告诉人们:忠勇的比干遭到贪婪暴虐的商纣王的迫害,生前就预测到了自己的结局,所以很早就嘱咐族人向南方沿海迁移,为免于迫害,全体子孙改姓为林。而妈祖传说中是海边林姓渔家女,被民间视为比干的子孙。作为传说中商纣王时代的忠臣,比干被民间奉为财神爷;他的子孙林默娘因为在海边搭救渔翁,为众人崇拜尊为海神。这也是一种迁移,因为政治动荡带来的迁移,一方面透露出避祸习俗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原文化和南方海洋文化的内在关联。

说起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关联,不能不提及主要分布流行在江西、福建、广东一带的客家文化。从客家文化的来源考证,他们最早的祖先来自中原一带,为躲避战争的灾难,大规模迁移到南方一些地方并以客家人自居。所以,在客家居住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很多北方中原人家的传统在延续,从祭祖、日常的饮食穿戴等方面,或多或少能看到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

说到天津的妈祖信仰,就要说到天后宫。天津最著名的两座天后宫始建于元代。大直沽天妃灵慈宫(东庙)始建于元至元年间(1281—1284年),是天津市最早的庙宇,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妈祖庙。后来由于战火,该庙被毁,只剩下一些建筑遗址,20世纪末,这里发掘出元代建筑基址与明、清时期的天妃宫大殿基址,并出土了大量的元、明、清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使得“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说法被证实。现存的天津天后宫(亦称天妃宫西庙)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明永乐元年(1403年)重建,是天

津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所以说,天津不能说天后宫,不能不说到这里的主神妈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天津皇会是围绕妈祖诞辰日进行的民间庙会表演活动。妈祖诞辰一般认为是农历三月二十三,过去提前一周就要举行各种花会表演和巡街活动,现在基本已经简化,通常就是农历三月二十二这天进行舍饺子活动。天没亮,全城各地的信徒和普通市民从四面八方赶到天后宫,把宫门团团围住,排队进去吃免费的素馅水饺。在信众看来,因为庆祝妈祖生日,这饺子就有了加持,有了福气,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拿到这份赏赐。

吃完二十二的饺子,天后宫前广场上开始各种花会表演,有各路高跷、法鼓、小车会、狮子会等,总共有几十道。过去是要请出娘娘的塑像抬着去走街,接受民众的朝拜,现在大多围起来,在广场上进行精彩的花会表演,各家都亮出绝活儿,展示自家花会的水平。民间花会相互之间都绷着一股劲儿,你强我比你更强,而且很多花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老爷子那辈就传下来,下一辈就格外在意,不敢在自己这里丢了这项技艺。

到了三月二十三正日子,民众又早早来了,原来这天要吃舍面,寓意长寿,也是排成长长的队伍,大家一人一碗面。吃完仍回到广场上看花会表演,信众会自动到大殿向妈祖娘娘进香,同时还到偏殿敬香。

民间花会丰富了天津人的节庆生活,也将妈祖信仰借助皇会的出行和表演深入人心。过去参加过皇会出行的花会被称为老会,民间花会也会论资排辈,有些干脆以是否出过皇会相区别。旧时天后宫里比较流行的一个仪式是拴娃娃,妈祖的海神功能被全面化,既是护海女神也是全能神,能够保佑天津城的平安,也有保佑妇女生育得子、人们治愈疾病等功能,尤其生育功能于坊间流传,天津地北来此求子的特别多。过去本地流行虔诚的妇女进香后要祈求一个泥娃娃,从庙里带走,一路上不能和陌生人说话,一直到家中放在卧室的一个隐蔽角落供奉起来。来年生了孩子,还需要到天后宫还愿。旧时天津民间把家里供奉的泥娃娃叫作大哥,后来带来长大的男孩子叫二哥。所以,天后宫泥娃娃大哥的习俗也反映了一个现象,即中国古代对传承交代根深蒂固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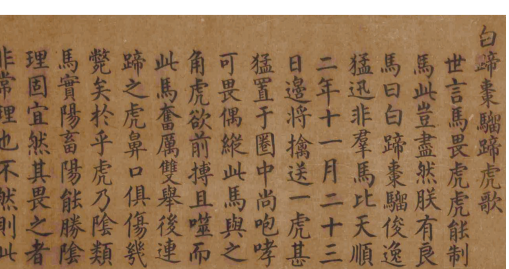
## 马背上的中国史(十一)

# 明代“弼马温”升职记

赵威

《西游记》里孙悟空“弼马温”官小故而大闹天宫,而明代真正的“弼马温”——摩牧马头(以下简称马头),却在严苛律法与现实困境中上演着更为曲折的生存故事。明代马文化的起起落落,恰如这群基层养马人的境遇,在制度的严密与崩坏间,映照着王朝的兴衰轨迹。

明初,朱元璋深谙“马者,甲兵之本”,设太仆寺专管养马,并在《大明会典·厩牧例》中定下11条严苛律法。民间实行几户共养一匹马,派丁粮丰厚的大户充当马头,专一养马;官牧则有明确定额,不足数便要答责官员。边境设茶马司,用茶叶换取边疆民族地区的马,还打造金牌信符防止舞弊。这一时期的马,形象写实矫健,明早期青花马纹碗上,马匹四肢修长、姿态昂扬,正是马政兴盛的鲜活注脚。然而好景不长,明中期马政逐渐废弛,“弼马温”们的日子愈发艰难。太仆寺官员贪污马料,豪强侵占牧地改为农田,而《厩牧例》的严苛律法反倒成了基层官吏勒索的工具。马头们不仅要承担马匹死亡的赔偿责任,还要应对层层盘剥,甚至有马头因赔补马匹而倾家荡产。马政的衰败最终酿成大祸。兵部尚书曾无奈奏报“军中多马皮包骨,难以应敌”,马荒之严重可见一斑。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带着大军亲征瓦剌,结果自己成了俘虏。后来,朱祁镇导演过一场“马虎搏斗”,并为优胜者写了一首赞歌——《白蹄枣骝踏虎歌》,他有一匹通身枣红色的骏马叫“白蹄枣骝”。明天顺二年(1458年)冬天,边将捉到一只猛虎,送给皇上,朱祁镇看着圈中不停咆哮的猛虎,突发奇想,命人将



天津博物馆藏朱祁镇《白蹄枣骝踏虎歌》